

吴丹◎著

《大乘大义章》

研究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吴丹◎著

《大乘大义章》

研究

佛学知识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乘大义章》研究/吴丹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7

ISBN 978-7-206-05744-1

I.大… II.吴… III.大乘—佛经—研究 IV.B9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8613 号

《大乘大义章》研究

著 者:吴 丹

责任编辑:关 静 封面设计:黄 鹤 责任校对:丁志辉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电 话:0431-85378028

印 刷:长春市太平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6.75 字数:18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5744-1

版 次: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 000 册 定 价: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中文提要

《大乘大义章》是研究罗什与慧远佛教思想的重要著作，也是研究印度佛教思想和印度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著作。

本书由慧远、鸠摩罗什二人讨论内容为线索，结合慧远与罗什现存的其他著作，力图对《大乘大义章》进行比较全面和客观地文本分析，还原慧远、罗什二人所以立论的基础，确切地反映二人在《大乘大义章》中所表达的思想。《大乘大义章》中所涉及的四大色法、法身、法界、法性等问题，为佛教宇宙论知识中的现象论以及般若实相问题；阿罗汉、菩萨、佛、涅槃等为境界问题，成佛、菩萨退转、授记成佛、菩萨遍学、修行住寿等为修行功夫问题。本书即以本体论、现象论、功夫论、境界论为架构，将《大乘大义章》中的重要概念进行解释分析，力图由现象论提供慧远、罗什二人所设想的世界构成图式，由本体论展示二人对于世界本质、生命价值的看法及可能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心性论思想，由功夫论说明二人对佛教的禅修操作方法的见解，由境界论表现二人对佛教理想人格状态的体悟。同时，本书从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着手，将《大乘大义章》置于印度佛学中国化的客观历史进程中，通过对慧远与罗什二人理论来源以及思想内容、思维方式的对比分析，展示《大乘大义章》对中国佛教义理发展方向的影响。

《大乘大义章》中，关于法身的性质是慧远提问的重点，在书中所占比例很大。慧远尽管接受了中观学派破“有”破“无”的思维方式，却还是执著于业报的主体，试图解决成佛的依据和可能性的问题。因此，慧远在《大乘大义章》提出的问题主要围绕法身的性质展开。在慧远看来，法身没有任何具体形象，但又是不灭不穷的真实存在。法身实有、永恒存在，是轮回的承担者、报应的主体。鸠摩罗什本着般若性空的立场，强调“法身”、“法性”并不是什么独立自在的实体，所谓“法身”、“佛身”，只是为了适应对不同人的传法需要而作的方便假说。万法是由众因缘会聚而成，佛法身也是因缘和合而生，毕竟空寂。

在讨论世间色法生成及性质的问题时，慧远立论的出发点是“因缘之生，生于实法”，所以分“有”为“因缘有”和“实法有”两类，并以“实法”作为“因缘法”得以形成的依据。罗什则突出“一切色皆以四大为根本”，目的在于引导慧远从其余“外道”、“邪见”中摆脱出来，而并未肯定“四大”是实。

在关于禅修论之间的问答中，鸠摩罗什以中观般若性空思想统率禅法，强调在禅观中要用般若智慧去观照诸法实相。慧远在理解禅定的境界、佛身的属性时，总是倾向于追求空有之上的最高实在，认为佛身、佛所居住的清净国土都是实有，对印度佛教的大乘空宗思想表现出不自觉的抵制和抗拒。鸠摩罗什一方面强调了以般若智慧领悟义理的重要，另一方面，又强调修习的重要性，强调“遍学”的意义。慧远在关于菩萨“遍学”问题的理解中偏重“顿悟”的观点。慧远并不完全反对大乘般若中观学说，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使他深切地认识到，只有直观具体、简易方便的修行方法才能满足中土社会和民众的需要，从而能够在社会中广泛传



播。

当涉及到“授记”问题时，慧远认为阿罗汉、菩萨、佛都是不同阶层的果位，是不同的修行导致的最终的实在的结果；而罗什则认为所谓“果位”也是毕竟空，只是修行毕竟空的不同阶段，修行的最终结果应该是“放舍止息”，“无所贪著”，即无作无为，无所挂碍。

从慧远向罗什请教的一系列问题看，慧远的思想是复杂的，他的佛教思想是印度大小乘佛教思想与中国固有的实在论和有神论相融合而成的。慧远虽然对般若思想内容有一定的理解和接受，但一直在追求一个“至极无变”的、绝对的实体性的东西，并以这种实体的真实存在作为其佛学理论的基石。在《大乘大义章》中，慧远总在询问各种事物和现象的性质，肯定着现象背后本质的确切存在，追求对每个佛学概念做出明确的回答。罗什对慧远问题的解答一以贯之地坚持着大乘中观学的思想内容、精神实质和思维方法。罗什从缘起性空的观念入手，认为本体自身不可思议，“实相”之说仅限在认识论范围。罗什采取彻底的否定式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即对于事物的真实存在、对于语言和逻辑判断分析作出彻底的否定，认为必须以全面破斥的方式，才能达到对宇宙人生本质（实相）的认识。

从慧远与罗什在《大乘大义章》的思想交锋中，可以发现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可能，这种可能预示着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方向。因此，慧远与罗什的讨论对于中国佛教“涅槃佛性”说、判教理论、禅修论等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



Abstract

The ultimate wisdom of the Mahayana is an important masterpiece not only for the study of the Buddhist thoughts of Kuma^{ra}ji^{va} and Huiyuan, but also for the study of the localization of Indian Buddhism in China.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between Kuma^{ra}ji^{va} and Huiyuan, and on the reference of other works of them, this thesis was conceived to make a relative thorough and objective analysis, revivifying the theoretical bases of Kuma^{ra}ji^{va} and Huiyuan, elucidating the ideas of the two pundits. The concepts of Four gross elements, Material existence, Reality body, Reality – realm and Dharma – realm are the problems on phenomenalism of cosmology and true original nature of Prajna; Arhan, Bodhisattva, Buddha and Nirvana are problems of Sphere or Visaya; Becoming a Buddha, the return from Buddha, the prediction of Buddhahood, etc are the problem of practice. The author interpreted and analyzed the important concepts of *The ultimate wisdom of the Mahayana* under the framework of ontology, phenomenalism, efforts and visaya. In addition, the author put *The ultimate wisdom of the Mahayana* in the historical procedure of localization of Indian Buddhism in China, compared the thoughts of Kuma^{ra}ji^{va} and Huiyuan, elucidat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ultimate wisdom of the Mahayana on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doctrines.

In *The ultimate wisdom of the Mahayana*, the nature of Reality body was one of the emphases of questioning, occupying a great part in the book. In the viewpoint of Huiyuan, the Reality body did not have any real image, but it was a undeniable and imperishable reality. In contrast, Kuma^{ra}ji^{va} held that Reality body had no absolute entity, and Reality body of Buddha was nothing but a reaction to the union of causes and conditions, also doomed to void and tranquil.

On the gener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terial existence, Huiyuan divided the Existence into two: the Existence for direct and indirect causes, and the Existence for Real elements, with the latter as the prerequisite of the former. While Kuma^{ra}ji^{va} wanted to guide Huiyuan to avoid the misleading of outside teaching and wrong views, disavowing the entity of Four gross elements.

In the discussion on cultivation, Kuma^{ra}ji^{va} guided the bodhisattva meditation with the idea of Ma^{dhya}mika Prajna features as emptiness, emphasizing that wisdom of Prajna should be used to analyze the true marks of all elemental constructs. In comparison, Huiyuan showed his unmindful resistance, in the obstinate believe of the pure dharma realm of Buddha really existed. Kuma^{ra}ji^{va} emphasized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ivation and extensive learning, without denying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doctrines with Prajna wisdom. Huiyuan declared the importance of Sudden Enlightenment in the extensive learning, for he was always seeking a direct and easy way of cultivation, especially for



the need of the Chinese grass roots.

About the prediction of Buddhahood, Huiyuan believed that the different Phala resulted from the different cultivation. Kuma^{ra}ji^{va} considered Phala an emptiness all in all, nothing but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cultivation. He claimed that people should be unconditioned and uncreated.

From all the questions Huiyuan consulted to Kuma^{ra}ji^{va}, we can find that Huiyuan's thought was a complex of Indian Mahayana & Hinayana Buddhism and Chinese theism and realism. Although Huiyuan had some understand on the Prajna thought, he kept himself in the stubborn seeking of absolute and eternal entity as the base of his Buddhist theory. To Huiyuan's questions, Kuma^{ra}ji^{va} consistently held the thinking methods, content and virtuality of Mahayana Ma^dhyamika thought, because he doubted the reality of entity, with the idea of causes originating from emptiness. He believed that the thought of true original nature was only the matter of epistemology. Kuma^{ra}ji^{va} declared that the true recognition of the nature of cosmos and life could only be reached with the complete negation in the thinking and epistemic methods.

In the conflict of Huiyuan and Kuma^{ra}ji^{va} on their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n *The ultimate wisdom of the Mahayana*, we could find the possibilities of merging of Indian Buddh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predicted 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development. As the conclusion, the discussion between Huiyuan and Kuma^{ra}ji^{va} had its vital importa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irvana buddha - nature theory, teaching classification theory, cultivation theory of Chinese Buddhism.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大乘大义章》概述	(12)
一、《大乘大义章》产生背景及主要内容	(13)
二、慧远及其佛教思想	(19)
三、罗什及其所译大乘经典	(37)
第二章 《大乘大义章》的法身观	(49)
一、慧远法身思想的理论背景与理论基础	(50)
二、慧远在《大乘大义章》中对佛法身的理解	(64)
三、罗什在《大乘大义章》中对佛法身的说明	(72)
四、小结	(80)
第三章 《大乘大义章》的色法观	(86)
一、四大与色法	(87)
二、“极微论”与反“极微论”	(93)
三、小结	(105)

第四章 《大乘大义章》的禅修论	(108)
一、罗什与慧远对“般舟三昧”的不同看法	(108)
二、罗什与慧远对“菩萨遍学”的不同看法	(125)
三、小结	(139)
第五章 《大乘大义章》的授记思想	(141)
一、授记问题提出的原因	(141)
二、关于菩萨授记的讨论	(143)
三、关于罗汉授记的讨论	(154)
四、小结	(160)
第六章 《大乘大义章》讨论问题的后续	(165)
一、道生的佛性说	(165)
二、僧叡对《般若经》、《法华经》态度的转变	(174)
结 语	(185)
一、罗什与慧远佛教思想的差别	(186)
二、印度佛教的中国化	(192)
参考文献	(198)
后 记	(205)



导 言

一、本书研究目的

东晋时期，长安和庐山是我国两大佛教中心，鸠摩罗什与慧远分别是当时我国北方和南方的佛教巨子。慧远与鸠摩罗什保持联系十多年，使南北两地佛教学术频繁交流，这不仅直接推动了当时佛教的流传，而且对于尔后中国佛教的发展、学派和宗派的形成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大乘大义章》正是这两位大师关于大乘要义的多次书面讨论的结集。《大乘大义章》，原名《慧远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并罗什答》，又名《鸠摩罗什法师大义》，收录于《卍续藏》第九十六册、《大正藏》第四十五册。全书三卷共十八章，二十七则问答，总计近四万字，内容为慧远提出关于大乘要义的若干问题和鸠摩罗什的答述。

慧远之前，支遁和竺道潜等不少学者都曾研究和讲述过《般若经》、《维摩经》、《法华经》等经典，更写了不少有关的论著，但是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格义佛教流行的时代。慧远之师道安开始致力于对流传于汉地的佛教经典进行整理，意识到运用“格义”等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术语、模式和思维方式理解、比附印度佛教的方法，无法真正把握印度佛教的精神实质。但是，由于历史时代的

局限，特别是佛教典籍的翻译处在相对零散的状况下，道安的佛教学术批评无法反映印度佛教的精神实质。因此，在中国佛教对印度佛教的整体把握和全面反思的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即使是最优秀的中国佛教学者也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印度佛教的精神实质，也无法真正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外来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鸠摩罗什翻译的大乘中观学派经典，就给中国佛教理解、解释印度佛教提供了信得过的“原本”。因此，《大乘大义章》的产生，是在中国佛教史真正意义上中国佛教对印度佛教的理解和解释的开始，从这个角度看，慧远是试图使中国佛教对印度佛教进行吸收和改造的第一人。

《大乘大义章》的研究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可以较全面地显示出当时佛学的水准。一方面，从慧远在《大乘大义章》中提问的内容可以窥见东晋末期中国佛教界对佛教教义的理解程度，以及在广泛的教义中，佛教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大乘大义章》中，关于法身的性质是慧远提问的重点，在书中所占的比例很大；其他关于菩萨修行成佛、大乘和小乘的区别，以及阿罗汉受记成佛等都是具有启发性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内容及其发展脉络具有较高的价值。另一方面，罗什的解答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大乘中观学的思想内容，把握印度佛教的精神实质和思维方法。同时，罗什对佛学的领悟也反映出印度佛教的思想动态，特别是大乘佛教兴起的过程和龙树空观思想的成立过程，这对于研究印度佛教思想史是可以借鉴的宝贵资料。

第二，由《大乘大义章》了解当时中国佛教界对罗什思想接纳的程度。

《大乘大义章》是集合慧远与罗什往返的书信而成，大抵上是由慧远提出问题，而由罗什进行回答。首先由慧远的问题中可以寻找出慧远的问题意识，明白他在般若与毗昙交涉时，最感困难的是关于究竟有没有组合成事物的基本元素，因此他一再询问有关四大造色与极微的问题。在般若与西方信仰交涉时，慧远则产生了信仰对象存不存在的问题，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探寻法身方面的问题。慧远的基础认识不但源于自己般若经典的精心所得，也有部分来自于僧伽跋陀等所译的小乘经典，这些他毕生所信仰的概念竟与罗什的般若思想有着相当的差距。很显然，罗什所传的般若思想已威胁到慧远原有的认识，由于对罗什的景仰，慧远并不立即对罗什发生质疑，而希望藉由书信讨教一个合理的解决。

罗什一路顺着慧远的问题，立于大乘空宗的立场进行解释。在解释的当中罗什一方面表明了般若与毗昙间关于造物基本元素的不同立场，一方面从空宗的角度说明法身的概念，清楚地指出有非真有、无非真无的般若精神。但这些深入而清楚的说明并不能改变慧远原有的概念，这个现象说明了罗什般若学在中国南方传布的真实状况，也显示了当时般若学传布的困难。

第三，《大乘大义章》的成立可以说是古印度民族思维和中国汉文化区域民族思维互相映照的结果，因此在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思维方法的对比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慧远是在汉文化传统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罗什则长期在浸透着思辨精神的典型佛教环境中活动，二人在佛教的哲学基础上即不相同，见地不同是自然的。《大乘大义章》相当集中地保存了这两种佛教体系、两种文化形态相互交涉的痕迹。例如，慧远在思想方法上具有强烈的决定论色彩，与罗什的非决定论很难在理论深层沟通。在第一章慧远问到“法

身”这个概念时，罗什似乎总轻易地以直观的立场，将这些问题打成了“不须”讨论的“戏论”，这样的答复显然不能令慧远满意，其后又陆续提出了许多与法身相关的问题，分别被收录在第二、三、四、五、七、八及十八章中。而罗什正是从慧远的提问中理解了中国思维方式与印度思维方式的不同，这无疑能够对他以后在中国的教学活动给予极大的启发和借鉴。

第四，到东晋之时，佛教的中国化正在逐渐深化之中。《大乘大义章》展示了南北佛教的两大领袖、也是中印佛教思想两大代表之间的直接讨论，他们的讨论自然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上的一个里程碑，对日后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中观学派思辨性的“诸法实相”、“法性”，虽然使中国学者大开思路，却不大容易为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所接受，而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中国人也总觉得应该有一个实在的主体来承担。顽强的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改造着外来的理论。慧远尽管接受了中观学派破“有”破“无”的思维方式，却还是执著于业报的主体，而且创造了“神”的概念。因此，慧远在《大乘大义章》提出的问题主要围绕法身的性质、菩萨以及阿罗汉如何能授记成佛等内容，体现出对众生成佛的可能性、依据及方法的强烈关注；而罗什则是以诸法毕竟空为论证的出发点来说明万法本性空寂、无作无为，很难从正面直接回答慧远一再追问的关于成佛的各方面问题。慧远在《大乘大义章》中问题的提出，表明中国佛教学者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必须有所选择地以中国传统思维的内容和方式理解和吸纳印度佛教思想，使印度佛教中国化。



二、前人研究成果

1. 对《大乘大义章》的研究

就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学术界对《大乘大义章》进行专门分析的论文只有两篇，一篇为张竞业的《〈大乘大义章〉简析》（《法音》1996年第11期），只是简单叙述了《大乘大义章》产生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及研究意义，并未对《大乘大义章》中所涉及的概念及思想进行进一步深入分析；另一篇为杜继文的《〈大乘大义章〉析略》（《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2期），文章从《大乘大义章》关于“实法”问题、“实相”与“法性”问题、“法身”与“神”、“我”问题三个方面比较了罗什和慧远两人在理论上的分歧，分析较为透彻，遗憾的是只涉及《大乘大义章》部分内容，并非全面的论述。另外，在一些佛学论文或专著中，有对慧远或罗什在《大乘大义章》中相关论述的引用，对进行《大乘大义章》的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大多只是为文章本身所立观点服务，很难全面客观地展示《大乘大义章》所体现的思想内容。

就慧远、罗什在《大乘大义章》中的立论基础来看，学术界普遍认为罗什所传为龙树、提婆的中观思想，其论述中最显著的特点是突出怀疑论的成分，从根本上否认语言概念在把握真理上的可靠性，否认人的认识能力。针对慧远的提问，他不承认有任何实体；也不相信有不灭的识神，甚至佛性、涅槃也不过是一种名言假设。佛是众生的自我创造，彼岸的净土并非真实存在。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中观学派的特点是激愤地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却缺乏真正正面的理论建树。这种思想固然适应罗什少壮时期

同小乘教团斗争批判的历史需要，但饱经人世忧患客居汉地的晚年鸠摩罗什早非昔比。加之汉地与西域民情、国情、文化氛围迥异，鸠摩罗什的存在价值乃依附佛教势力的僧团首领，形势对他提出的要求已非动摇而是确立佛教的坚定信仰和僧团的神学地位。在这一新形势下，他是否对自身的佛教思想和思维方式作出修正还有待考察。因此，对罗什在《大乘大义章》中思想内容的分析，必须历史地客观地予以把握。

关于慧远在《大乘大义章》中的这些提问，有两种解读。过去的研究里，如吕澂等学者认为慧远对“法”的理解，应是归为毗昙学立场的；而其它如汤用彤等学者则以为，慧远继承道安的般若学，立场应是般若空系的理解。这两种倾向，多少有些偏颇。从佛教发展史来看，印度佛学有它自身的发展脉络。但印度佛学转入中国，决不会按照它学说发展次第来介绍，而是混杂在一起传播。汉地僧人在接受时，则按自己原有的知识积累，打破印度佛学的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内在逻辑，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试图取得崭新的统一的理解，为自身整个佛教思想体系的建立寻找统一的根基。慧远所接受的思想影响比较庞杂。他在儒学上造诣很深，研究道家老、庄也颇有心得。基于珍视西来圣典得之不易的态度，慧远对于庐山译出的一切佛典，都以恭谨戒慎之心，反复研读再三。他受中观学派的影响，学习过毗昙学，又接受佛驮跋陀罗禅法，还信仰西方弥陀净土。因此，对慧远在《大乘大义章》中立论基础的研究，必须从慧远所处时代背景出发，以慧远在《大乘大义章》中的论述为基础，结合慧远所存其他著述进行，从而全面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及印度佛教思想对其佛教思想体系的建立所产生的影响。